

東夷夷以北則絕地離類是以國隔羊時不
足方其仁展禽李路不足方其清潔寇惠
施不足方其智甯封錢鏐不足方其靜而
幽雅釋茂缺於江南郭陸狀條晒茲閣
之使廢社稷禘禴之報林於汲土掘
新故承跼靡隕落兮柳下之行非所

黃道周書法研究

小物通大道

師天地之世喜奉理輒以纖子嗟謫長
世嚴子裸袒還雜吾無所憾兮以為
逆沐

作榕頌久不敢示人有稱

顏同翁亭西瞻州之美者移此頌之猶

人之繩溫室也

黃道周書

陳新長 著
CHEN XINCHANG ZHU

黃道周是一個時代的書法藝術達到了時代的高峰。黃道周小物，“學問中第七八乘事”，他的書法是他心志的寫照，是抒发思想，也热爱书法艺术，长期以来投入了精力学习古人经典，对魏晋钟王的追随成为他的艺术旨归。

XIAOWU
TONG
DADAO



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小物通大道:黄道周书法研究 / 陈新长著. -- 兰州: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5527-0454-9

I. ①小… II. ①陈… III. ①黄道周(1585-1646)
— 书法评论 IV. ①J292.1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15487号

小物通大道——黄道周书法研究

陈新长 著

出版人: 王永生

责任编辑: 田园

装帧设计: 孟孜铭

出版发行: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址: 兰州市读者大道568号

邮编: 730030

电话: 0931-8773149(编辑部)

0931-8773112(发行部)

E-mail: gsart@126.com

网址: <http://www.gsart.com>

印刷: 甘肃澳翔印业有限公司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16

插页: 2

字数: 200千

版次: 2016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书号: ISBN 978-7-5527-0454-9

定价: 8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序

李逸峰

对于书法来说,明末是一个光彩夺目的时代,新长先生近年来将目光聚焦于明末诸家,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先前《仰望王铎》的出版,引起书坛的广泛关注,而今《小物通大道——黄道周书法研究》即将付梓,此书显然是明代书法个案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

新长先生有着良好的历史观与方法论,从书法本体出发,结合明末的时代特点与闽南的地域文化,对黄道周的书法艺术、道德人格与思想根源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与探讨。

黄道周是一个时代的样本,其书法艺术达到了时代的高峰。黄道周虽视书法为小物,“学问中第七八乘事”,但小物通大道,书法是他心志的写照,是抒发思想情感的途径。他热爱书法艺术,长期以来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学习古人经典,对魏晋钟王的追随与推崇成为他的艺术旨归。新长是精通翰墨的书者,他对书法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尽管黄道周的书法别具一格,但其内

在的学书思路,新长了然于胸。他认为,首先是黄的取法理念在魏晋以上,倾心于魏晋“遒媚”书风,“可以看出他对魏晋审美理念的准确领悟与把握以及对锺王的仰慕,可谓一往情深,自然也包含了个人对创作实践甘苦的深刻体会,对高格调艺术品位的不懈努力勇猛追求”。而具体的技法训练胎息锺王法帖。新长通过对具体作品的考察,发现其小楷严谨规正,较多地保留了锺书的“古质”;从行草来看,二王风韵“消化为黄道周笔下的使转和洒脱”。黄道周书法优游于锺王之间,兼收并蓄,加之并不排斥唐人法度,对颜真卿的篆籀笔意、中锋行笔与内蕴刚猛的笔法颇为喜欢,对怀素的连绵大草中锋的裹毫挥洒也多有参照。新长还注意到,黄道周视野开阔,对金文、章草与隶书都有体会,并打上了碑学的时代烙印,最终熔铸一炉,形成自己的书法语言,展示出独特的艺术风貌。作者的分析从具体的点画入手,解剖字法章法,从字内空间到结构样式,从用笔特点到内容选择,注重用事实说话,绝不信口开河,并对黄道周的作品加以辨伪,体现出作者作为书家内行的体验与眼光,作为学者严谨朴素的作风和文风,的确值得称赞。

讨论中国书法从来不能离开书家为人,人品与书品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黄道周作为一个时代的样本,还表现在他的人品道德也达到了时代的高峰。

新长先生从时代背景入手,将黄道周置于明末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挖掘出被历史浪潮所裹挟的黄道周坚定的道德信仰与强大的人格魅力。这一点,作者立足书法,加以拓展,立体地展示黄道周丰富的心灵世界。他关注到黄道周人生中一个重要的书法时间节点——崇祯十三年,即公元1640年,这一年离明朝灭亡仅仅四年。这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一个混乱的时代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这一年黄道周被上司举荐不成,反因小人作梗,致使崇祯以为上下结党,以致被冤入狱,廷杖八十,辗转受辱,“赭血满衣,疮痍蔽褥”。然而,在如此不堪忍受的环境下,黄道周居然手抄《孝经》,一年时间竟达120遍,每月十遍,即三天一通。按常理,狱中条件极其恶劣,心中冤屈不得申诉,哪有心思练习书

法?新长不愧为黄道周的知音。他对这一事件做了深入地分析,看到了这一举动的象征意义。他没有否认这一事件的直接动因源于狱卒乞书,书写《孝经》,“以当役钱”。但从所书作品来看,黄绝非应付了事,而是倾注心力,寄托情感。这种分析很透彻,他看到了《孝经》这一儒家经典作为超越法律刑罚之上的价值评判与道德标尺,在黄道周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所以,黄的抄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书法行为,首先是一种重大变故后的自我心理调适,力图将《孝经》开宗明义中所主张的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身体发肤降至最低伤害限度。其次是通过狱中这一举动弥合忠孝之间的裂痕,达到“移孝为忠”的目的。狱中抄写《孝经》的心情是痛苦的,没有对其丰富的内心世界进行深入解读,简直无法准确理解其背后的复杂情怀。作者通过对黄道周所受儒家思想教育的背景、忠孝思想践行的日常表现、《孝经》研究的思想倾向等多个方面的解读,尤其通过与崇祯帝、杨嗣昌关于“夺情”一事进行激烈辩论的深刻理解,最后,总结出黄道周狱中抄写《孝经》120遍,是对《孝经》“移孝为忠”思想的诠释和超越。这种历史叙事法与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有相似之处,其分析具体,令人信服。作者进而对《孝经》思想进行阐发,认为黄道周大体遵循着《孝经》“事亲——事君——立身”的模式,但又超越了这个模式,包括黄对《孝经》的研究,目的是“无不极力推衍孝道”,试图以“孝”而非以“忠”来挽救世道人心。作者认为,沿着这一思想轨迹,黄道周的孝道思想已经不仅在于表达自己的“移孝为忠”,更是站在时代的高度,倡导儒家修齐治平的崇高理想,达到力挽狂澜的时代目的。黄道周明白,可以用一支短笔,宣告价值评判与道德标尺。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黄道周眼中,书法虽为小物,亦是大道。

黄道周深受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影响。他生在闽南漳浦,这是人文鼎盛之区,又是宋代大儒朱熹活动的故地。黄道周自然接受前代哲人的熏陶,涉猎广泛,学问渊博,加之明末思想活跃,黄道周凭着独特的个性置身其间,无论思想还是艺术,都会挖掘自己的根基,生长自己的枝叶。即使是高手林立的明末,黄

道周也如一棵傲然挺立的苍松,经历着霜雪严寒,收获着崇高壮美。

明末书家见证了时代的风云,彰显着人性的复杂。黄道周、倪元璐、傅山、王铎、张瑞图、徐渭以及八大山人,等等,在复杂的时代浪潮面前,谁也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但黄道周立定脚跟,捍卫明王朝哪怕是偏安一隅的主权,维护自己的坚定信仰。《论语》中说,“士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黄道周正是这一儒家道德人格与艺术理想的思考者与践行者,在书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陈新长与黄道周展开了一场穿越四百年时空的对话。我的序,顶多算是在他俩对话的间隙插了一句言。

(作者系书法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书法文化研究院副院长)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晚明社会文化与学术思潮	1
第一节	晚明政治与社会概述	2
第二节	批判思潮的多元涌现	4
第三节	闽南地域文化与学风	6
第四节	对宋明儒综合的反思	7
第五节	经学思想的注说发挥	9
第六节	用易学研究天文历算	11
第七节	子学意识与神仙外丹	12
第二章	黄道周生平与思想历程	16
第一节	少年早慧与多方游历的文士之风	17
第二节	进则建言与退则讲学的儒者风骨	22
第三节	以身殉国与求仁得仁的外王实践	29

第三章 书法是黄道周生活的实录	39
第一节 明末清初各家中的翘楚	39
第二节 最能见苏东坡相传之脉	41
第三节 书法生涯里重要的年份	45
第四节 力求古法而能间出己意	49
第五节 书风开始走向成熟天成	55
第六节 在人生艰难中宣泄豪情	58
第七节 阅历学养及书法的纯熟	61
第八节 向壮烈行进的艺术表达	65
第四章 黄道周返璞归真直溯源头的小楷书风	69
第一节 始学锺繇而气息直逼锺繇	69
第二节 摆脱妍媚书风的自觉追求	75
第三节 用笔险峻峭拔却隶意浓厚	79
第四节 高古质朴而又能清刚劲健	84
第五章 黄道周行草书用笔结体的特征	87
第一节 笔墨骨力给人以向善向上的力量	87
第二节 浑厚润泽的线质充满了弹性韧性	90
第三节 圆转方折表现出流畅刚猛的犀利	94
第四节 欹侧取势产生的不平衡动态效果	99
第五节 结体呈扁横势中宫紧收内敛含蓄	104
第六章 黄道周行草书字密行疏的空间构成	109
第一节 空间意识是一种书法修为	109
第二节 善于营构画面空间立体感	113
第三节 紧凑细密的内部空间效果	117

第四节	正欹跌宕的外部空间感觉	120
第五节	丰富多样的空间连接方式	122
第六节	一笔墨浓不凝滞枯不瘠薄	129
第七节	《洗心诗轴·尘垢辞虞夏》辨伪	132
第七章	黄道周对《孝经》独特的诠释	138
第一节	重《孝经》与明孝文化的大德要道	138
第二节	对《孝经》的道身体力行堪称楷模	140
第三节	对《孝经》的研究达到了时代高峰	142
第四节	对《孝经》的理解倾向孝道派主张	144
第五节	书《孝经》是“移孝为忠”的诠释超越	148
第八章	黄道周书法“遁媚为宗”的审美特征	155
第一节	“遁”与“媚”的审美概念和标准	155
第二节	“遁媚”作为书评的审美体现	157
第三节	“遁媚”成为魏晋审美的主流	160
第四节	“遁媚”是对锺王风格的体悟	165
第五节	“遁媚”审美境界的不断拓展	171
第九章	黄道周“小物通大道”的书学思想	175
第一节	书法对于美的超功利性色彩	175
第二节	把书法作为通往大道的工具	180
第三节	视书法为自身同一性的存在	185
第四节	先文而后墨的书法创作主张	189
第五节	不因人废书的作品评判标准	193
第十章	黄道周书法创新所达到的时代高度	198
第一节	开辟了不同以往书风的新模式	198

第二节	心学在晚明书法变革中的作用	203
第三节	徐渭书法创新范式过渡性特征	209
第四节	完美体现时代精神的艺术典范	211
第五节	黄道周对二十世纪书坛的影响	215
附录		221
黄道周生平大事年表		221
黄道周书论选		231
黄道周主要传世作品目录		237
黄道周常用印章		242
后记		244

第一章

晚明社会文化与学术思潮

黄道周(1585年—1646年),字幼玄,又字细遵,号石斋。^①福建漳浦镇海卫(今福建漳州东山县铜陵镇)人,学者称石斋先生。明隆武谥“忠烈”;清乾隆谥“忠端”。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举于乡试,天启二年(1622年)中进士。“其学深于天人之际,极博穷微,皆本于《六经》”,“从之问业者几千人”,^②天启、崇祯朝历任翰林院编修、詹事府少詹事等职,南明弘光朝任礼部尚书,后又拥立唐王朱聿键于福州,位居首辅,以隆武朝武英殿大学士兼吏、兵二部尚书的身份率师抗清,兵败被俘,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年)殉节于金陵。

黄道周学问博通,著作宏富,其主要学术著作有:《三易洞玑》《易象正》《洪范明义》《榕坛问业》《孝经集传》以及《礼记》经解五篇等。^③《四库全书》收其个人著述达十部之多。东林之后,明末大儒公推刘宗周和黄道周。近世以来,学人多重船山、梨洲、亭林诸公,以为明末三大家,然顾、黄、王皆于清初成学名,若论晚明之季,则不得不让于二周。^④《明儒学案》把黄道周作为独立

的思想大家列入“诸儒学案”，足见其在明清之际的学术地位。

和明末的很多大儒一样，黄道周对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都有反思，他不满宋儒的道统观，反对气质之性的说法，主张天命性善一元论，这些都显示了他对先秦原始儒学和汉儒的回归倾向。黄道周重视经学，尊重汉儒，倡导博物之学和实测之学，这对明清之际的经学复兴和实学思潮的兴起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应看到，黄道周受汉代今文经学的影响很大，讲天人感应，又以其独特的象数字宙学和象数历史学推步天道和人事的治乱，这在明清之际却又是少有而独特的。黄道周的子学意识以及他对神仙外丹的兴趣，作为一代大儒，这在明清之际、在历史上都是比较罕见的现象。黄道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学的影响，但他的易、历、律一体的思想无疑又具有非常典型的中国文化特色；他较早地以道器来论中西科学及其文化精神的差异，他对中国文化的前景有着深沉的忧虑。

第一节 晚明政治与社会概述

明王朝在历经二百多年的承平之日后，整个社会呈现出了巨大的内在紧张与无法聚合的离心力。如同其他朝代末世的情形一样，它处于分崩瓦解的前夜。而当时思想文化也不断变化，极为多元，且与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晚明思想文化开始出现由传统儒学向近代思想转型的迹象。这种在思想文化领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源于当时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商品经济得到高度成长。这一情形在明代中叶就已露端倪。在经济方面，晚明在正嘉以后，官营手工业衰落，匠籍制度变化，官营手工业允许工匠“纳价准工”，为民间手工业开辟了技术和劳动力的新来源，民营手工业长足发展；农村小商品生产者不断增加，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扩大和农副产品进一步商品化；私营纺织业、冶矿业的发展，扩大商品市场，等等，这都给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到正德年间，经济领域开始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尤其是白银由民间社会自发崛起，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成

为一种可以信赖的稳定的货币,它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使得市场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白银货币化过程,是中国社会经济货币化的过程,也是中国市场经济萌发的过程,它直接导致了晚明社会带有根本性的社会变迁。明初严格的户口登记制度和路引制度的破坏,导致人口大规模流动,使全国成为互相影响的整体,打破了单一闭锁的生产和生活结构,为新风尚产生提供了土壤,为传播提供了媒体和途径。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提高了人民的消费水平,影响了人们的社会生活,冲破了原来使社会窒息的禁纲,使社会风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晚明时期,东南沿海的国际贸易的繁盛更加表征了商品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晚明社会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人们对于奢靡物欲的追逐,进而影响到社会风习的更迭。而对于传统社会产生冲击与挑战的新观念抑或新思想也不可回避地在学术思想与社会的互动中凸显出来。

除了晚明社会经济的变化对思想产生重要影响外,政治局势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考量因素。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攻克抚顺,侵入辽东,开启了以清代明的序幕。明朝中后期政治统治的松懈也直接促进了晚明社会风尚的变化。晚明的统治机构之涣散,远远超过了前代,从16世纪上半叶起,嘉靖皇帝就不见朝臣,隆庆皇帝即位三年不处理朝政,万历皇帝三十年很少上朝,直至崇祯以前,大约有一百年的时间,除了张居正一度整顿朝政外,长期以来帝国的最高主宰不理政事。大臣与皇帝见不到面,上了奏章无人看,官吏可以任意弃官回家,地方官吏更是擅离职守,有的衙门十多年无专人负责。万历四十年,中央六部门只剩下一个刑部尚书,都察院八年没有正官,御史一百一十名,在职的只剩下九名,不及十二分之一。边防军请发军饷,没人签发;各处解银无人征收,外藩进贡无人接待,刑部长年不审案,监狱里长满了青草。宦官专权,朋党倾轧,厂卫横行,政治黑暗。从上到下“职业尽失,上下解体”。在这种情况下,更利于社会风尚冲破礼制的束缚并得到发展。张居正身后的明朝形势逆转而下,朝着无可疗救的方向发展,内忧外患一步一步吞噬着明朝仅存的气数。张居正改革是明中后期一次规模最大、力度最强、触动最深的改革,其目的就是为了整治腐败。但

是他死后,反改革的腐朽势力把持朝政,改革遭到破坏,大部分改革成果,特别是整顿吏治的成果付之东流,此后直至明亡的半个世纪中再也没有出现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这标志着明朝封建统治集团已经丧失自我调控能力,自万历中期以后,政治腐败已成不可阻止之势,社会阶级矛盾愈来愈尖锐,统治阶级分崩离析,再加上对天灾丧失抵抗能力,终于导致农民大起义的爆发和明朝的灭亡。史家称:“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万历中期以后,已出现“崩解之势”,是符合实际的。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政治层面的衰变与危机,却往往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焕发学术思想的活力。当时学术思想呈现多元的异动情状:程朱理学、阳明心学以及针对二者的批判思潮共生其间。

第二节 批判思潮的多元涌现

晚明批判思潮的衍生,与人们对于宋明道学或理学的反思与批判有关。“道学”这一概念在宋代以前是没有的。宋代之前,人们虽有“道”的观念,但无“道学”这一名词。“道学”或者“道统”概念是儒者们为了辟佛、老等所谓异端邪说,标举儒学正统地位而设立的。较早勾勒儒家道学谱系的当属唐代韩愈。到了宋代,程颐重提“道统”。

朱熹(1130年—1200年),集宋儒之大成,更为明确地标示儒家道统传承之链。正如宋代叶采为朱子《近思录》卷14题:“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道统相传,至于孔子,孔子传之颜曾,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遂无传焉。迨于宋朝,人文再辟,则周子唱之,二程子、张子推广之,而圣学复明,道统复续,故备著之。”^⑤“道统”这一概念较早由朱熹提出来之后,“道学”代表了对上述道统谱系中所有学说思想的称谓。不过,在朱熹的眼中,“道统”与“道学”是有所分别的。朱熹认为,“道统”是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内圣外王合一的学政统系;而“道学”是指孔子所开创的学术统系。然而,两者具有共同的东西就是“道体”,

而这个“道体”指的是《中庸》所谓的“孔门传授心法”。后世将“道学”与“道统”两概念等而观之,是自朱熹弟子黄干开始的。他针对周公而后的道、治分裂的情形,造成“治统”这一概念来与“道统”概念对举。^⑥总之,宋代儒者通过追溯道统谱系的历史渊源来确立“道”尊于“势”的学术理据,从而达到“致君行道”抑或“引君行道”的目的。这种学术思维模式是从宋代,尤其是从朱熹这里开始的。在朱熹时代,出于党争需要,“道学”一词曾被指称为异端邪说,但是,自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被官方确认以后,以朱熹的学术思想为代表的儒学得到尊奉,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并渐渐兴起一股延续几百年的“道学思潮”。

自南宋理宗以后,实际存在着一股秉承朱学传统的道学思潮。尽管王阳明打着挑战程朱理学的旗帜,而提出异于朱熹的“致良知”之学。

明代中期以后,程朱理学在科举制度程式化的束缚下,逐渐僵化。它已不能很好地应对时代问题所提出的挑战。加之正德、嘉靖年间,西北边境战争不断,各地藩王觊觎中央政权,土地兼并激烈,流民暴动不断。江南一带商品经济发达,而功利主义思潮随之滋长蔓延。诸如上述情形,致使王阳明对当时学术人心产生了深深的焦虑。从宋代程朱理学到明代阳明心学的几百年中,道学思潮成为了宋明儒学的主流。

王阳明(1472年—1529年)之后,其学术分化较大。在晚明清初的学者看来,江右之学尚能得其宗传,而以王龙溪为代表的浙中王门,尤其是泰州之学渐渐失却了阳明的宗旨。至此,阳明心学随程朱理学一道,成为当时大多儒者批判的主要对象。

晚明时期,以儒家的“内圣外王”作为最高追求的士大夫们的思维路径是:政治的颓败、社会的动荡根源于学术人心的败坏;学术人心不治,政治社会遂不可治。这一“学术以经世”的思维模式,使在晚明社会背景之下的学术思潮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动。因学术环境的变化,晚明相继出现了多元化的学术批判思潮。这些学术批判思潮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在对宋明道学的批判基础上形成的。

晚明社会大体存在如下三种互为交叠而又各有侧重的批判思潮:

早期启蒙思潮。明代中期以后,社会危机日益凸显,程朱理学因自身僵化而

无力应对这一危机。于是,对于理学的批判思潮应运而生,并逐渐开启了早期启蒙思想的新路。

综合朱、王的理学修正派思潮。晚明学术思潮日渐多元,居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程朱理学,颇有日薄西山之感。即使是后来居上的阳明心学,此时也显现出了颇为引人焦虑的流弊。宋明时代儒家学术系统中的两大理论形态——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都面临着时代的巨大挑战。“修正思潮”便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产生的。

经世实学思潮。明代中后期经世实学思潮的涌动,风云际会,至晚明几十年间达到了高峰。

第三节 闽南地域文化与学风

一个人的生活经历及其所在的地域社会文化必定对其思想产生重要的影响。福建简称“闽”,在唐宋以前,被人视为尚未开化的蛮荒之地。后来中原政权的政治经济重心南移以后,福建才渐次得到开发。唐末五代之后,因战乱而迁居的移民与众多文人寓居闽地,福建的文化才出现飞跃式的发展。唐末以后,福建的海外港口贸易的兴盛也进一步带动了这一地区的文化发展,至宋代,闽文化进入高度繁荣阶段。

而闽南地区又是福建地域文化中一个较有代表性的区域。自唐末至宋以后,代有人出,学术文化、教育事业十分发达。其中原因主要有如下三方面:

首先,就闽南学术、文教的兴盛来说,与其经济的发展可谓密切相关。唐宋时期,福建泉州设贸易港口,成为当时全国重要的对外贸易场所。明代漳州月港开放海禁,成为全国唯一的私人海外贸易港口,对经济的发展影响较大。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经济的发达,仍逃不脱政治文化的规制。人们好入政治仕途的观念并未因之而改变。因此,大量财力投向了科举为官之路。当时书院、社学与义学等学术、科考机构大量出现。“成化、弘治年间,福建书院开始重新抬升,嘉靖年

间进入高潮。漳州社学在明前期高达 280 所,远远高于全省其他地区,结合这一情况,漳州月港的兴起对于文教格局的作用不言自明。”^⑦由此,当时闽南地区呈现“人文蔚起,冠盖林立”^⑧的情形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次,地域文化的繁盛与否和地理环境也有某种程度的关联。漳浦县自然环境优越,素有“金漳浦”的美称。该地自宋明以后,就成为人文鼎盛之乡,尤其是在明代。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明代漳州进士以漳浦、龙溪两地最为密集,占该地区的 65%,且两地进士均集中在正德以后。”^⑨而黄道周就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

最后,宋代以后,闽南地域文化特色的形成还得益于具有个人思想魅力的学术领袖与精英,如宋代朱熹及其弟子黄干、陈淳,明代陈剩夫、周瑛、黄道周等人。他们对于闽南地域文化的塑造可谓有大功。朱熹之于闽南的意义等同于孔子之于邹鲁。朱熹曾做过漳州知府,其文教惠泽于民,对该地民风民俗的教化影响深远。宋理宗以后,朱子之学得以大力彰扬,元、明时期被立为官学,成为科举取士的合法依据。它逐渐蔚起,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这些经过几百年的学术文化积淀对于闽南地区地域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反之亦然,闽南地域文化的色彩在一定程度上也熏染与塑造了其文人群体抑或个体的思想性格。

第四节 对宋明儒综合的反思

黄道周对宋明儒的看法较为复杂,一方面,他的很多思想与问题意识都是承接宋明儒而来;另一方面,在很多问题上,他对宋明诸儒又有批评。早在 34 岁时他就对宋儒的“道统观”表示不满,认为儒者与豪杰均可以成为圣人,认为汉儒也有很多可取之处,他说:“有宋诸君子既不得于时则退修其身,若孟子所谓穷居见于世,是亦圣人之徒矣;而必以为圣人之统必自此而开,则将何所置彼宋前诸君子也哉?”“若夫广六经之意,发自杼轴,适值其穷,近于仲尼之遭者,其惟